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

唐世平

内容提要:本文对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既有文献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为建立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了部分基础。目前,许多运用“安全困境”的概念来理解族群冲突的尝试都是建立在对此概念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之上。“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动态、通用和强有力的战略互动理论,而这一理论抓住了引发战争的一般性动力。因此,“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铺平了道路,而这样的理论也能整合国际关系理论中各个学派对族群冲突的不同理解。文章最后分析了该理论的可行性和价值。

关键词:“安全困境” 螺旋模型 族群冲突 广义理论

引言

正如杰维斯所言,当一个好的理念出现时,我们倾向于广泛地扩展、延伸和应用它,却不去考虑它的问题和局限性。^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个

* 本文的英文版参见 Tang Ship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2, 2011。文章是在王凯翻译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第一部分的译文基本参考尹继武翻译的唐世平所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第二章的部分译文。本文中文版的出版获得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作者和他的合作者关于族群冲突的最新研究进展,参见王凯、唐世平:“族群冲突:一个基于安全困境的‘机制+因素’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 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Working Paper, May 2014; Shiping Tang and Hui Li, “Location, Location, and Location: The Geography of Oil and the Risk of Ethnic Conflict”, Working Paper, June 2014。

^① Robert Jervis,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1988, pp. 317-349, p. 318.

好的概念。^①因此,当很多人扩展、延伸和应用它来“阐释国际关系理论和安全政策的诸多重要的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②实际上,虽然“安全困境”通常被认为是防御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概念,但是几乎所有非现实主义范式都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它。例如,许多非现实主义范式的支持者声称,他(她)们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建立国际制度、推动民主化还是重新建构国家认同——之所以能够带来和平与合作,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些建议能够缓解“安全困境”。^③

尽管族群冲突古已有之,^④但苏联解体引发的地区族群紧张关系与冲突以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暴力性瓦解再次让族群冲突受到普遍的关注。而这些地区的中央政权的崩溃和随后出现的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为国际关系学者将“安全困境”的概念应用到解释族群冲突现象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因为“安全困境”的发轫恰恰需要一个(事实上的)无政府环境作为前提。这两个原因使得大量文献开始关注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概念也由此成为理解族群冲突的一个重要工具,一些专家据此提出了许多解决族群冲突的具体方案。^⑤

本文将批判性地审视既有文献对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分析。^⑥首先,许多

①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1951; 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ter 3;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②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p. 171-201, p. 172.

③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39-51; Lars-Erik Cederman, “Back to Kant: Reinterpre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as a Macrohistorical Learning Pro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2001, pp. 15-31;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71-81.

④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⑤ Chaim D. Kaufman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139-175.

⑥ 本文仅关注那些将“安全困境”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作品。查姆·考夫曼应用“安全困境”来证明族群冲突最好的解决措施是分治,但是他对“安全困境”的讨论非常简略,而且基本上重复了波森的观点,参见 Chaim D. Kaufman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ivil Wars”, pp. 147-50。威廉·罗斯声称发展了一些关于“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的假设,但是他实际上并未将“安全困境”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参见 William Rose,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ome New Hypotheses”,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4, 2002, pp. 1-51。相反,他的分析工具是进攻-防御理论,因为他错误地将进攻-防御理论理解为“安全困境”理论所必不可少的成分。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进攻-防御理论的问题以及它与“安全困境”的关系,参见 Shiping Tang, “Offence-defence Theory: Toward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2, 2010, pp. 213-60。梅兰德1999年和2009年的两部作品同样建立在“安全困境”的基础上,但是总体上却在强调“先发制人的需要”。笔者在下文关于保罗·罗的章节中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参见 Erik Melander, *Anarchy Within: The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Emerging Anarchy*, Departmen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Uppsala University, Report No. 52, 1999; Erik Melander “The Geography of Fear: Regional Ethnic Diversity,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5, No. 1, 2009, pp. 95-124。

运用“安全困境”的概念去解释族群冲突的尝试都是建立在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解之上的。由此而来的后果是,这些文献虽然有助于揭示族群冲突的某些动力,但同时也遮盖了族群冲突中的一些基本事实。

“安全困境”确实能够被用来解释族群冲突,但前提是需要准确理解这个概念。笔者认为,“安全困境”理论(模型)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通用和强有力的国家或群体互动理论,而这样一个理论抓住了引发战争(包括族群冲突)的一般动力。^①因此,“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能够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以及合作)理论奠定部分基础,而这样一种理论也能容纳大量的解释因素并整合不同学派(比如现实主义、社会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和理性选择学派)对族群冲突的理解。

正确理解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既有学术价值,也有政策意义。在理论方面,因为“安全困境”集中关注国家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见下文),而如何应对这种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正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②所以正确理解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可以将该讨论与国际政治中的一些核心辩论联系起来。在政策方面,评估对方的意图(并理解螺旋式冲突的性质)对于己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非常重要。此外,准确评估当事双方的意图对于采取合适的调停和干预方针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③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笔者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的更为缜密的再界定;^④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批判了“扩张主义者”和“瘦身主义者”对此概念的滥用;第四部分强调“安全困境”理论对于构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所凸显的价值,并指出了构建该理论的未来方向;最后为简要的结论。

①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2008, pp. 451-470. 我们应该将“安全困境”现象和“安全困境”理论(或者模型)区分开。“安全困境”是用来描述一个特定现象的概念。“安全困境”理论是一系列的知识,它力求理解“安全困境”的深层原因、调节机制和影响。

② 此处,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动机(motive)和意图(intention)。动机是国家的(直接)利益,或者说是对目标或结果的偏好。意图是国家对战略或行为的偏好。因此,即便所有国家都想拥有权力,恶意国家会通过主动威胁他国来获取权力,而善意国家则不会这么做。关于对战略的偏好和对目标的偏好之间的差别,参见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1994, pp. 313-344, esp. 318-21.

③ 由于提出遏制族群冲突的政策建议存在极大的复杂性,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探讨。关于早前较好的讨论,参见 Daniel Byman, *Keeping the Peace: Lasting Solutions to Ethnic Conflict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p. 587-623.

一 “安全困境”的重新表述

通过批判性地检视和发展巴特菲尔德、赫兹和杰维斯对“安全困境”概念的早期阐述,^①笔者为“安全困境”概括了一个更为缜密的定义。出于对这三位学者杰出研究的尊重,本文将这一定义称为“BHJ 陈述”(BHJ formulation)。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详细阐述过,“BHJ 陈述”对“安全困境”(作为一个现象或一个理论/模型)和螺旋(同样作为一个现象或一个模型)做了明确区分,使定义更加缜密,用途更加广泛。“BHJ 陈述”澄清了现有文献的诸多困惑和矛盾之处,捕捉且整合了大量存在于国家间或群体间互动的因素/动力和见解,最终展现出一个逻辑自洽的战争与和平理论。^②本节将简单地概括这一表述以及对后文讨论的重要意义。

“安全困境”至少具有八个主要特征:(1)“安全困境”的本源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③(2)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不能确定彼此当前和未来的意图,部分的原因在于意图可能发生变化。结果,国家往往会彼此恐惧(或,另一方可能成为掠夺者);^④(3)“安全困境”起源于无意:只有在两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才可能存在真实的“安全困境”(亦即两国只想要安全,并非故意要威胁其他国家);^⑤(4)由于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国家诉诸权力或能力的积聚,以此作为防御的手段,而这些能力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进攻性的能力;(5)“安全困境”的动力是自我强化的,并且经常导致(非意图性的和恶劣的)螺旋式的情境,诸如关系的恶化、军备竞赛和战争;(6)“安全困境”的动力倾向于使某些增加安全的措施——例如,积聚不必要的进攻性能力——适得其反。比如,积累了不必要的进攻性能力反而更不安全;^⑥(7)“安全困境”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会导致悲剧的结果,诸如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战争;(8)“安全困

① 布斯和维勒 2008 年的专著是最近探讨此概念的另一力作。Ken Booth and Nicholas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不幸的是,他们对此概念的理解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Sh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② Sh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③ 在族群冲突的背景下,无政府状态可以是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de facto anarchy*),即中央政权的崩溃。在此,无政府状态不应被理解成“安全困境”的直接原因,而应是“安全困境”出现的一种必要和许可条件。参见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2000, p. 12。

④ 尽管从逻辑上说,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必须先于恐惧,并且从本体论上说,它们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所以在图 1 中笔者将它们列在一起。可参见 Sh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⑤ 笔者追随学界的传统,将对“安全困境”的讨论限定在只含两个行为体的案例中。增加一个可能参与潜在冲突的第三方无疑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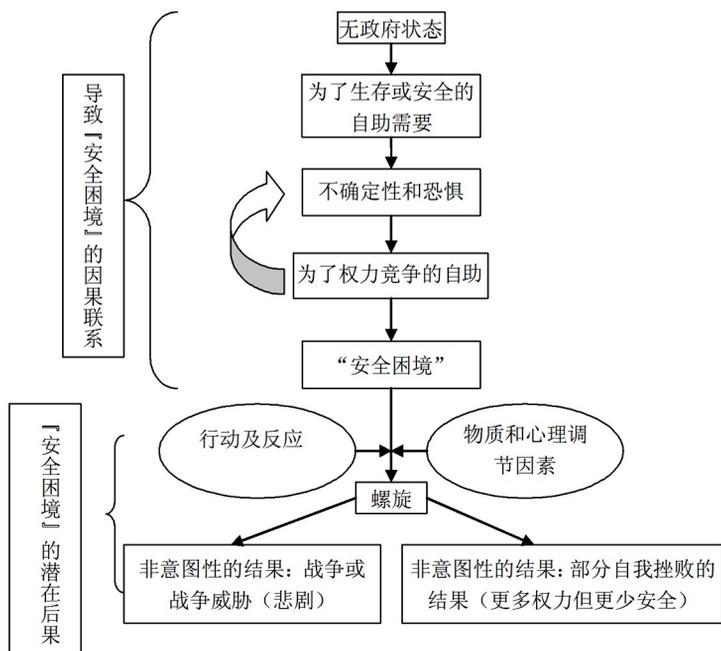
⑥ “安全困境”的存在仅仅意味着一些自助手段将是“自我挫败”的。换言之,另一些自助手段并非是“自我挫败”的;它们确实能够提升国家安全。

境”的严重程度可由物质因素(如地理、不均衡分配的权力)和社会心理因素所调节(如族群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最坏情况下的心态)。

其中三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无政府状态(这导致了不确定性、恐惧和为了生存和安全的自助需要);双方均无恶性意图;以及一些权力的积聚(包括进攻性的能力)。其他方面,是“安全困境”的结果或调节者,并且对于“安全困境”的兴起和持续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换言之,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核心条件才能使某一情境成为真正的“安全困境”;如果缺少这三种条件,无论它们有多大的作用,也不会出现真正的“安全困境”。

显然,在上述更为缜密的定义下,从无政府状态到“安全困境”,再到战争的整个因果链条是冗长而非直截了当的。上述因果联系可以表述如下:无政府状态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导致恐惧;恐惧产生权力竞争;权力竞争引发(潜在的)“安全困境”;而被激活了的“安全困境”通过螺旋式发展导致战争(见图1)。

图1 从无政府状态到“安全困境”、再到战争的因果联系



注:图由作者自制。

在对“安全困境”作出缜密界定后,我们必须强调以下九个直接的推论。

第一,图1的上半部分阐述了“安全困境”的根本和表层原因,而下半部分描述的则是“安全困境”可能产生的潜在后果,上述两个部分必须分开来理解。尽管“安全困境”可能产生某类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这类结果都是由“安全困境”产生的。因此,“安全困境”可以产生非意图性的和自我挫败的结果,但不是所有此类结果都是由“安全困境”引发的。^① 同样地,尽管“安全困境”会产生(不好的)螺旋式的情境(例如关系的恶化),但不是所有的螺旋困境都是由“安全困境”引发的。^②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尽管“安全困境”会潜在地导致战争,但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由“安全困境”引发的。^③

第二,我们应该将引发“安全困境”的最初导因(无政府状态、不确定性和恐惧,以及一定的权力积聚)和“安全困境”的物质和心理调节者清晰地区分开来。尽管调节者控制着“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但是它们既不能引起“安全困境”,也并非维持“安全困境”所必需的。^④ 因此,即便一些调节因素(例如错误知觉)加重了某一(诸如螺旋式的)情境,并不意味着这一情境就是“安全困境”。同理,缺失了一些调节因素也不意味着这种情境就不是“安全困境”。

第三,我们应该将引发“安全困境”的最初导因和“安全困境”所引起的潜在中间后果区分开,尽管这些中间后果可以通过某种反馈机制反过来强化“安全困境”。例如,尽管军备竞赛能强化“安全困境”,但军备竞赛是“安全困境”的一种可能的(中间)结果,而不是最初导因。同样地,虽然某些国家行为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不确定性和恐惧,继而恶化“安全困境”。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不应与最初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不确定和恐惧相混淆。反馈并不是原因。

第四,最为关键的是,上述三种必不可少的方面(无政府状态、恶意的缺失和一些权力积聚)对于一个真实的“安全困境”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忽视了上述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不能仅仅因为某一情境具备“安全困境”

① 例如,威慑(阻吓)政策同样可以、且经常产生非意图性的和自我挫败的结果。参见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1, 90。

② 例如,冷战的早期历史(大约1944-1948年)是一种经典的螺旋(亦即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但冷战的这部分历史并非“安全困境”,也不是由“安全困境”所引发的。

③ 对此关键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Sh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hapter 3, 以及该书中的参考文献。

④ Andrew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p. 371-400;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2-67;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1992, pp. 507-508。

的几个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就认定这一特定情境是一种“安全困境”;只有当且仅当某一情境具备“安全困境”的所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时,它才是一个“安全困境”。假如你将具备一些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却缺乏“安全困境”必不可少的因素的情境也认定为“安全困境”,那么“安全困境”作为一个概念就将“陷入这样的危险:它变成一个无意义和模糊的术语,泛指任何关系恶化”。^①

第五点直接来源于第四点。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一定的权力积聚即便不是永恒的、也是经常出现的。所以,对于确定某一情境是否为真实的“安全困境”来说,恶意的缺失是最为关键的要素。^②在某一情境中,当一方或双方是恶意的(亦即具有意图上的威胁),即使这种情境具备了“安全困境”的所有其他方面,诸如螺旋式和非意图性的结果,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安全困境”。

第六,“安全困境”是条件性的,并非普遍的。因为“安全困境”需要恶意的缺乏才能存在,当一国或两国均故意威胁彼此时,无论另一方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之间就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困境”。

第七,“安全困境”在起源上是结构性的,而非知觉性或心理性的。只有竞争的自助无政府状态才能产生“安全困境”。

第八,正因为“安全困境”包括了上述方面,作为一种概念和理论的“安全困境”极具包容性又极受限制。“安全困境”可以容纳诸多的情境和因素(例如地理、仇恨),但是某些情境和因素确实不属于“安全困境”,无论“安全困境”被看做一个概念还是一个关于国家互动的理论(例如恶意)。

第九,清晰地区分“安全困境”(模型)与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的差别是有益且必要的。螺旋模型并不需要互动双方同时缺乏恶意才能存在:螺旋模型与存在恶意或恶意的缺失均能兼容。换言之,螺旋是普遍的,而“安全困境”是具有条件性的。但是,“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之间存在一个可逆且递进的连续谱(continuum):“安全困境”可以转化为螺旋,一旦一方或双方产生恶意(例如,一方或双方变得如此惊恐,以

^①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of Southeast Asia*, p. 24.

^② 显然,我们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他者目前的意图并预测其未来的意图。该问题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笔者在此仅仅指出两种解读国家目前意图的基本方法:(1)观察该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2)战略保证(reassurance),即首先表明自己的善意,然后通过理解该国对自己善意信号的反应来估计它的意图。笔者在一本专著中发展了战略保证理论,它的核心是通过理解意图来塑造和平,参见 Sh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ter 5.

至于它们可能决定为保障自身的安全去寻求侵略)。^① 以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既有文献对族群冲突中近似“安全困境”情境的描述实际上应该纳入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中,而不是被置于更为严格的“安全困境”模型内。显然,只有跨过善意和恶意的分水岭,实际的冲突才会爆发。

二 三波扩张主义者

巴里·波森最先运用“安全困境”概念来解释族群冲突,斯图尔特·J·考夫曼和保罗·罗随后继承并发展了波森的研究。在明确了“BHJ 陈述”的缜密逻辑后,本节将批判性地检视他们的主要著作,并解释为什么这三位学者对“安全困境”的运用是建立在过度延伸和扩展此概念的错误之上。

(一) 巴里·波森

巴里·波森认为:“帝国的崩溃可以被视为一个突现的(emerging)无政府状态”。由此,他认为我们可以有效地运用“安全困境”理论来解释这种在突现的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族群冲突。波森对“安全困境”的定义如下:“即使国家并没有扩张主义的倾向,它们仍然能够触发这些反制行为(reactions)。这就是‘安全困境’:一方力图增强自身安全的行为将会引发另一方的反应,并最终导致自身更加不安全。”在他的研究中,波森只提到了“安全困境”八个要素中的六个:(1)无政府状态(或者是实际上的、突现的无政府状态);(2)恐惧(隐含在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性中);(3)缺乏扩张主义者的(或者是恶的)意图;(4)自我挫败的结果;(5)一种能够导致两个国家采取预防性和先发制人行动的行为-反制行为的螺旋;(6)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不可分割性、进攻-防御平衡、地理,以及潜在盟友对“安全困境”的调节。^② 其中值得强调的是,波森确实将“安全困境”的关键性要素——缺乏恶意——包含在了他的定义中。

但是,波森随后的论述却与此相矛盾。他认定克罗地亚境内的克罗地亚族和塞尔

^① 关于“连续谱”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这个动力可以被理解为战略偏好的变化——从防御性到进攻性,即使对目标的偏好(安全或权力)未发生改变。在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安全驱动的”或“防御性”扩张。一旦将战略偏好与目标偏好区分开,我们会清楚地发现扩张是恶意国家的专有特征,而“安全驱动的”或“防御性”这些标签所指代的善意与扩张是不相容的。接受“安全驱动的”或“防御性”扩张的概念等于承认恶意国家和善意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esp. Chapter 1, 3。

^② Barry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Vol. 35, No. 1, 1993, pp. 27-47, esp. pp. 27-35. 笔者在“Offence-defence Theory”一文中讨论了进攻防御理论的关键部分——进攻-防御平衡(offence-defence balance)。简言之,笔者证明了进攻-防御平衡是毫无价值的理论骗局。

维亚族之间仍然存在“安全困境”，尽管“有非常多的信号表明[双方都怀有]恶意”。^①在此，波森暗示“安全困境”与恶意的存在是相容的。毫无疑问，该观点与他之前对“安全困境”的定义是不相容的。

(二) 斯图尔特·J·考夫曼

继波森之后，斯图尔特·J·考夫曼通过三篇文章确立了“安全困境”在族群冲突研究领域的牢固地位。^②在第一篇文章中，考夫曼并没有定义“安全困境”，但他对“安全困境”的误解已很明显。考夫曼不断宣称“精英领导的暴力……创造了一个‘安全困境’”，“暴力沙文主义的上升创造了一个‘安全困境’的螺旋”。^③可是，根据“BHJ陈述”，暴力沙文主义仅仅只能恶化(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同时，(零星的)精英领导的暴力可能会促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转化成安全威胁的螺旋现象，也可能暴力本身就是“安全困境”或冲突螺旋的产物(详见下文)。

考夫曼对杰克·斯奈德的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误解同样显而易见。考夫曼认为，斯奈德将结构性“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每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其他国家的不安全的情形”。^④可是实际上，斯奈德将“安全困境”——而不仅仅是结构性“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每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其他国家的不安全的情形”。^⑤

在随后的两篇文章中，考夫曼确实试图定义“安全困境”，并给出了两个看上去相同但实际上差别很大的定义。考夫曼先引用了杰维斯、斯奈德和波森的著作，将“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国家增强安全的尝试会威胁其邻国安全的情形。当这种情形出现时，邻国经常会为了自卫而采取抗衡性措施，于是第一个国家感觉到了威胁，不断升级的敌意螺旋随之产生。关键的一点是，冲突并不一定是侵略性意图的产物，而是来

① Barry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p. 37.

② Stuart J. Kaufman, “The Irresistible Force and the Imperceptible Object: The Yugoslav Breakup and Wester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2, 1994-1995, pp. 281-319;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96, pp. 149-71;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pp. 108-38. 考夫曼最近的作品基本上承袭了他早期对“安全困境”的理解，但好像降低了“安全困境”的重要性。参见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10, p. 12; Stuart J. Kaufman, “Symbolic Politics or Rational Choice? Testing Theories of Extreme Ethnic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p. 45-86.

③ Stuart J. Kaufman, “The Irresistible Force and the Imperceptible Object: The Yugoslav Breakup and Western Policy”, p. 282, 285.

④ Ibid., p. 293.

⑤ Stuart J. Kaufman, “The Irresistible Force and the Imperceptible Object: The Yugoslav Breakup and Western Policy”, p. 293; Jack Snyder,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in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Stein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5.

自于这种情形的结构,即‘结构性安全困境’。最终的结果有时候就是战争”。^①

相反,在另一篇文章中,考夫曼保留了波森和斯奈德的定义却放弃对杰维斯的引述,进而提出了一个存在明显差异的定义。“‘安全困境’有赖于一种相互间对灭绝的恐惧,即一方为避免毁灭而采取的行动会被另一方视为可能导致己方的毁灭。此外,‘安全困境’还有赖于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的情形,以及(如果战争可能爆发)保证双方都能够参战的军事手段……那么,每个群体对灭绝的恐惧可能就变得合情合理,因为它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可能确实受到了其他群体的目标的威胁。到达这个阶段后,每个群体被迫采取极端措施(特别是建立和使用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并胁迫其他群体。事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在这种情形下,一方寻求增强自身安全的措施会产生使另一方更加不安全的效果。”^②很明显,在他的第三篇文章中,考夫曼仅仅注意到了下面这些“安全困境”的要素:(1)实际上的或突现的无政府状态;(2)恐惧;(3)存在胁迫性的军事力量;(4)螺旋(行为-反制行为的动态);(5)非意图性的后果;(6)结果(比如战争)。最重要的是,虽然考夫曼在第二篇文章将“恶意的缺失”列为定义的一部分,但是他的第三篇文章却舍弃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从而导致对“安全困境”的应用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总的来看,考夫曼犯了下述四个相互强化的错误。

首先,他对“安全困境”的非意图性来源置若罔闻。通过多处重复强调“安全困境”是被恶性意图和挑衅行为所“制造”(create)、“引发”(cause)或“煽动”(provoke)的,考夫曼明确地将“安全困境”归为“意图性”而非“非意图性”的结果。^③当涉及精英领导的族群冲突时,考夫曼写道:“此时的‘安全困境’非该情形所固有,而是被一方或双方好斗的精英所制造出来的”,“精英们故意引发大众的敌意和‘安全困境’”。^④当讨论大众领导的族群冲突时,他同样宣称:“长期存在族群间敌意推动精英在族裔问题上采取越来越极端的立场。这样的行为制造了‘安全困境’。”^⑤此外,他坚称“无

^①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pp. 150-151. 敌意同时可以表示一种情感状态或一种行为(敌意动作)。考夫曼使用敌意来指代一种情感状态,“大众不会参与族群暴力,除非他们怀有敌意,即除非他们想要伤害另一方”。参见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11. 显而易见,这种状态等同于恶性意图。

^②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09, 111.

^③ 这些动词散落在考夫曼的两篇文章中,可参见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p. 150, pp.154-157, p.161;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07, 109, pp.111-112, p. 117. 相比之下,这些语境中更合适的动词应该是诸如“恶化”(exacerbate)、“加剧”(aggravate)和“固化”(harden)之类的词。“provoke”(煽动或激发)这个词可以同时表达“cause/incite”(导致/引发)和“aggravate/inflame/arouse”(恶化/加剧/激起)的意思,但是在考夫曼的讨论中,“provoke”等同于“create”或“cause”。

^④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p. 158, 170.

^⑤ Ibid., p. 150.

政府状态和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并不足以导致那些本已和平共处了几十年的群体出现‘安全困境’。相反,族群“安全困境”在根本上有赖于敌对意图的激发:“族群‘安全困境’建立在相互之间对群体灭绝的恐惧之上。但是,除非充满敌意的大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定义他们的安全,或者‘争相竞价’(outbidding)的精英将这种极端安全作为政策目标,否则这种恐惧难以发酵。”^①

其次,通过在他的理论解释和经验案例中反复重申实际的暴力必须发生在“安全困境”之前,考夫曼暗示“安全困境”和实际的暴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后者导致前者。^②这样的观点与“BHJ 表述”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后者明确承认“安全困境”是导致大规模暴力(即战争)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虽然一些极端措施和零星的暴力往往能够恶化“安全困境”或被激活的冲突螺旋。

再次,考夫曼误解了“安全困境”的螺旋动力。在考察摩尔多瓦德涅斯特地区的案例时,他断言:“最终,极端主义者组织了民兵和军队发起暴力性的挑衅。如果另一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安全困境’便产生了,并且在暴力的宣传中被不断强化……驱动民族主义极端分子采取暴力方式的原因是保守政府和随后的亲俄者对某些族裔性诉求(尤其是语言法规)的抵制,而这些诉求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是群体生存的必备条件。”^③在现实中,(冲突的)螺旋远在潜在的受害者有所反应之前就已经被开启:一旦中央政权崩溃,不确定性和恐惧产生,螺旋就已经被开启。

最后,考夫曼的讨论大量借鉴杰克·斯奈德对“结构性‘安全困境’”和“知觉性‘安全困境’”的理论区分。但是,斯奈德的这两个概念也是建立在误解“安全困境”的基础上的。^④

通过探究侵略性行为的不同解释方式并将国家区分为安全追求者和扩张(或权力)追求者,斯奈德识别出四种可能的解释:结构性“安全困境”、知觉性“安全困境”、帝国主义者的(安全)困境和僵局。^⑤显然,他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仅仅对应于一种包含物质调节因素的“安全困境”,而“知觉性‘安全困境’”则对应于另一种同时包

①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12; See also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p. 156;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p. 12, 34.

②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pp. 19–22, p. 63.

③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17, 124.

④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同样,柯林斯比较简略地指出,考夫曼应用“安全困境”概念的知识基础来自于杰克·斯奈德,而且考夫曼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斯奈德。参见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of Southeast Asia*, p. 25, 193, fn. 67.

⑤ Jack Snyder,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pp. 155–156, p. 160. 帝国主义的(安全)困境描述的是一个恶意的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善意的现实主义国家之间的情形。显然,斯奈德不应该将其归为“安全困境”。而僵局被认为等同于两个恶意国家间的情形。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此外,斯奈德用追求安全的国家来指代善意国家,详见下文。

含物质和知觉(心理)调节因素的“安全困境”。因为无论在结构性“安全困境”还是在知觉性“安全困境”中,一对行为体都是善意的国家,所以这两个标签描绘的都是真正的“安全困境”。虽然斯奈德对“安全困境”的定义没有将恶性意图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在这两种“安全困境”的情形下可以存在一个或两个恶意国家(即国家之间存在故意伤害)。即便如此,斯奈德仍然误导性地将“安全困境”的两类调节因素(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当做两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困境”。实际上,“结构性”和“知觉性”“安全困境”描述的是两类调节因素,而非两种“安全困境”。^①

相比之下,考夫曼走得更远,他曲解了斯奈德的理论并将其应用到自己对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理解中。这导致考夫曼的“结构性‘安全困境’”和“知觉性‘安全困境’”几乎与斯奈德原初的表述大相径庭,而其与“BHJ表述”的差距更大。

考夫曼声称,族群间最开始的“安全困境”近似于“知觉性‘安全困境’”。^②更重要的是,他认定“知觉性‘安全困境’”是虚假和不危险的,而结构性“安全困境”是真实和危险的,前者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被转化为后者。“无论在族群冲突还是在国际冲突中,知觉性‘安全困境’的真正作用在于它能够引发真实的、结构性的‘安全困境’……因此,暴力的开始是一种知觉性‘安全困境’……其结果就是一种结构性‘安全困境’”。^③那么,知觉性“安全困境”是如何转化为结构性“安全困境”的呢?根据考夫曼的观点,其原因包括对安全的极端定义、暴力和实际的冲突。^④

对于考夫曼来说,从无政府状态到族群冲突的因果链条是:从有敌意的精英开始,历经知觉性“安全困境”、充满敌意和极端主义的政策、实际的暴力和冲突,再到结构性“安全困境”(大众的敌对暴力行动或竞相竞价的精英促使局势的恶化并向知觉性“安全困境”转化),最后发展成全面战争。^⑤不难发现,考夫曼误解了“安全困境”,而杰克·斯奈德对此概念的延伸也存在问题。实际上,考夫曼明确拒绝了对“安全困境”的“BHJ表述”：“新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概念并不能够被机械地运用到族群冲突中……”^⑥因此,他随后对“安全困境”的运用一直游离在“BHJ表述”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保罗·罗

①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②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12, 124.

③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p. 152. 很显然,考夫曼在此仅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斯奈德的两个标签:“知觉的”意味着虚假的(因为危险程度更低),而“结构的”意味着真实的(因此危险程度更高)。

④ Ibid., p. 162, 158.

⑤ Ibid., pp. 154-155.

⑥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12.

保罗·罗对“安全困境”的理解可以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他在第一阶段迈向了正确的方向,但在第二阶段却走了歪路。^①

(1) 1999年和2000年的文章

在前两篇关于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文章中,罗提到了“安全困境”的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非意图性后果(即悲剧);第二,非意图性;第三,不确定性(关于国家的意图);第四,“安全困境”的调节者(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进攻-防御平衡);第五,突现的或者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第六,行为-反应动态(模型)和感知到的先发制人的需要。^②最重要的是,他明确承认关于意图性的问题是“安全困境”的核心。^③于是,罗恰如其分地指出,此前的波森、考夫曼和埃里克·梅兰德都忽视了非意图性这个关键因素,因此全部采用了对“安全困境”的“宽泛”(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说是“错误”)定义。^④

尽管罗的很多观点值得称道,但是罗对“安全困境”的理解不够准确也不够完整。除了未能意识到考夫曼对斯奈德的“知觉性”和“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误解,以及没有足够清晰地阐明对他者的恐惧(即他者可能抱有恶意)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犯了以下三个主要的错误。^⑤

首先,受惠勒和布斯的影响,^⑥罗宣称,进攻和防御的不可分割性是一个“(‘安全困境’的核心(定义))”。^⑦但是,进攻和防御的不可分割性并非是激活“安全困境”的必备条件:它仅仅能够调节“安全困境”。而且,即使进攻和防御可以被完全区分开,“安全困境”仍然能够运转。^⑧

① 罗犯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过度依赖那些误导性的二分法来区别两类国家——善意国家和恶意国家。这些二分法包括现状国-修正主义者、追求安全-追求权力等。对此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 1。有意思的是,尽管在2001年的文章中,罗的关注点从国家的目标转移到了国家的战略(他称之为“安全需要”),这种转变本应该驱使他更加重视行为意图,但是他最终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因为他彻底地将恶意的缺乏排除在“安全困境”的定义之外。详见下文讨论。

② Paul Roe, “The Intrastate Security Dilemma: Ethnic Conflict as a ‘Traged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2, 1999, pp. 183-202;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3, 2000, pp. 373-393, esp. pp. 375-380.

③ Paul Roe, “The Intrastate Security Dilemma: Ethnic Conflict as a ‘Tragedy’?”, p. 186;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pp. 378-379。可惜,与其他人相似,罗并没有将“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区分开。

④ Paul Roe, “The Intrastate Security Dilemma: Ethnic Conflict as a ‘Tragedy’?”, p. 200;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p. 388; Erik Melander, *Anarchy Within: The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Emerging Anarchy*.

⑤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pp. 377-378, p. 380.

⑥ 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John Baylis and Nicholas Wheeler eds., *Dilemma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

⑦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p. 375.

⑧ Andrew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Shiping Tang, “Offence-defence Theory: Toward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其次,罗坚持认为最坏情况假设(worst-case assumption)对于推动“安全困境”中的行为-反应螺旋是必要的。^①但是,“安全困境”螺旋的运转并不需要最坏情况心态: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恐惧。最坏情况心态是恐惧的一种极端形式,或许这种心态仅仅在“安全困境”最终转化为实际冲突的过程中才是必要的。^②

最后,罗不断引用埃里克·梅兰德的错误论述,认为先发制人的需要是任何“安全困境”的一个特定前提。^③罗没有认识到,先发制人战争的吸引力是“安全困境”螺旋的结果,而非前提。^④

(2)2001年和2004年的文章

在2001年的文章中,罗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为“严格的表述(即BHJ表述)并非最合适的方法”,并且谈到他“并不知道‘安全困境’的准确定义是什么”。^⑤这就导致除去上文提到的三个主要错误之外,罗又犯了三个根本性的错误。

首先,罗不再重视“安全困境”非意图性的成因,转而支持格拉泽的观点,即贪婪国家也能被容纳进“安全困境”模型中,而这种观点正是罗之前所坚决反对的。罗现在主张“关于贪婪国家和非贪婪国家的争论或许应该被认为是不恰当的”。^⑥

其次,罗现在将“非意图性后果”置于“安全困境”定义的核心位置,基本上将它等同于非意图性。因为即使恶意行为也能导致非意图性结果,^⑦但非意图性结果本身并不代表缺乏恶性意图。此外,“非意图性后果”是结果,而非意图性是“安全困境”的基本组成单位。这样来看,“非意图性后果”和非意图性并不是等价的。

最后,罗借用了博尔丁的有用但是未经具体阐述的二分法(真实的相容性和虚幻

①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p. 376; See Also Paul Roe,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1, 2001, pp. 103-116, at p. 105; and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4, 2004, pp. 280-313, at p. 283.

② 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最坏情况假设的深入讨论,参见 Sh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③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p. 376; “‘Actors’ Responsibility”, p. 106; “Which Security Dilemma”, pp. 283-284. See also Erik Melander, *Anarchy Within: The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Emerging Anarchy*, p. 21.

④ Sh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⑤ Paul Roe,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pp. 111-112. 在他随后的两部作品中,罗基本上继承了他在此文中的理论观点。毫无疑问,他对“安全困境”的延伸受到了杰克·斯奈德和罗伯特·杰维斯的相似立场的鼓励。Jack Snyder and Robert Jervis, “Civil War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Barbara F. Walter and Jack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5-37, esp. pp. 19-20.

⑥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 288, fn. 34. See also Paul Roe,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p. 110;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pp. 190-191;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p. 91-121, esp. pp. 117-119.

⑦ 例如,希特勒妄图赢得二战的胜利,最终却失败了。

的相容性)来替代意图性问题,并以此作为判断“安全困境”情形是否存在的关键问题。^① 罗写道:“我对‘安全困境’的分类是建立在相容/不相容的安全需要而非善/恶的意图的基础上。”^②在判断一个情形是否是“安全困境”时,由于罗无法解决如何去测量国家的意图这个核心难题,他转而采取了回避问题的态度。^③

更糟糕的是,即便在真实和虚幻的相容性的区分问题上,罗再次犯下两个错误。首先,罗忽视了博尔丁的两分法存在缺陷,而杰维斯对此早已指出。^④ 实际上,博尔丁自己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二分法的缺陷,他认为“即使真实的不相容性也是国家形象而非物质因素的函数,因而受制于变化和控制”。^⑤ 如此一来,博尔丁明确地指出,安全需求同时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⑥ 罗未能意识到安全需求的双重性导致虚幻的不相容性并不适用于替代恶意的缺乏来作为“安全困境”的基本要素。例如,即使行为体之间的客观安全利益是相容的,但是由于一方或双方故意以一种扩张的方式来定义他们的安全利益,并追求这种不恰当的目标,虚幻的不相容性也会产生,可是这种情形并不能用“安全困境”来分析。这种主观不相容性和客观相容性的结合就是一种虚幻的不相容情形。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安全困境”,因为此处虚幻的不相容性是由一方或双方故意扩张性地定义并追求他们的安全利益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一方或双方此时已经抱有恶性意图了。^⑦ 由此,“安全困境”仅适用于一部分虚幻的不相容情形,因为虚幻的不相容性也可能源于恶性意图。同样重要的是,主观的“虚幻的不相容性”(假设客观上存在相容)完全可以是“安全困境”动态的结果。这样来看,虚幻的不相容性无法替代恶意的缺乏,来作为判断一个情形是否属于“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⑧

其次,罗将自己关于相容性的大量讨论置于安全追求者和权力追求者的二分法基

^① 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pp. 120-131, esp. 130-131.

^②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 288, fn. 34. 罗依赖(虚幻)的不相容性的倾向早已体现在他之前的文章中,只不过当时他并未发展这些思想。参见 Paul Roe, “The Intra-state Security Dilemma: Ethnic Conflict as a ‘Tragedy’?”, pp. 187-188; “Former Yugoslavia”, pp. 379-380, fn. 5.

^③ 不得不承认,部分的原因在于学界还缺乏一个能够理解意图的好理论。

^④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5-76.

^⑤ 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p. 130.

^⑥ 关于这个重要的区分,也可参见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7, No. 4, 1952, pp. 481-502.

^⑦ 当然,如果虚幻的不相容性来自于一方或双方的错误知觉,即他们相信相互间的安全利益是不相容的,虽然现实中他们相互间并不怀有恶意,那么这种情形就是一种经典的“安全困境”。

^⑧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pp. 605-607.

础之上。^① 对于罗来说,判断一种情形是否是“安全困境”的根本标准是:(1)两国的安全需求是否相容;(2)即便虚幻的不相容性会导致两国相互采取反制措施,两国是否仍然属于“安全追求者”。

罗认为,当两国存在相容的安全需求时,双方必然会相互表示善意,“(严格的)‘安全困境’”因而在此适用。^② 相反,当两国存在不相容的安全需求时,双方肯定会表现得更有攻击性,“(严格的)‘安全困境’”因此不再适用。基本上,罗将国家对自身安全的定义——即国家的目标/动机、或对结果的偏好——等同于它的意图,或者对战略的偏好。^③ 不幸的是,这种做法早已被认为是不恰当的。^④ 此外,罗从来没有分清他讨论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维度的安全需求。

更进一步来说,对追求安全和追求权力的二分法既是误导性的,也是不可操作化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同时追求(绝对或相对的)权力和安全。而且,权力和安全肯定会相互作用,权力还构成了安全的部分基础,所以“不可能明确地区分生存的意愿和权力的意愿”。^⑤ 总而言之,将国家区别为权力追求者和安全追求者的二分法进行操作化是非常困难的。^⑥

(3) 误入歧途

在2004年前后,因为罗的分析存在大量谬误,他对“安全困境”的理解以及在族群冲突分析中对此概念的运用越发显得逻辑混乱。他的错误也在对三种“安全困境”类型——“严格的‘安全困境’”、“常规的‘安全困境’”和“松散的‘安全困境’”——的区分中达到极致。^⑦ 罗的类型学恐怕仅仅在丢弃意图性这个核心问题上,并将其随意替换为追求安全的动机或虚幻的不相容性时才可能有些意义。在他的类型学中,只有“严格的‘安全困境’”这个标签是与“BHJ表述”一致的,因为它描述了两个善意国

① Paul Roe,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pp. 106–110;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p. 300–311.

② Ibid., p. 106.

③ See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 302.

④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⑤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0, p. 42.

⑥ 更细致的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ter 1。

⑦ Paul Roe,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pp. 106–111;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p. 284–291.

家之间的互动情形。^①

通过引用斯奈德的定义,^②罗认为,“常规的‘安全困境’”指的是“一种每个国家相信自身的安全必然导致他国不安全的情形”。^③罗没有认识到他的“常规‘安全困境’”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安全困境”,或者说仅仅是由“安全困境”螺旋导致的一种结果。如果一方或双方都开始相信“安全困境”螺旋动力的存在使得故意威胁另一方是获得自身安全的途径,那么这种情形描述的就是“安全困境”螺旋引发的后果。但是,一旦一方或双方开始相信故意威胁另一方是获得自身安全的途径,那么这种情形就不再是“安全困境”,而是真正的安全威胁。当然,如果一方或另一方在一开始就相信故意威胁另一方是获得自身安全的途径,那么这种情形就绝不可能是“安全困境”。

罗的“松散的‘安全困境’”描述的是两个同为恶意国家之间的互动情形。因此,对罗来说,“在一个松散的‘安全困境’中……似乎并不需要区分行为体到底是安全追求者还是权力追求者”。^④当然如此,因为如果安全追求者指的是善意国家,此时完全不存在安全追求者。很明显,这种情形不可能是一种真实的“安全困境”,就如同罗此前承认的那样。^⑤

总体来看,罗的“安全困境”不再是一种悲剧。只有他的“严格的‘安全困境’”要求非意图性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悲剧。相反,他的“常规的”和“松散的”“安全困境”并不要求非意图性,因此不再成为真正的悲剧。

罗对三种“安全困境”类型的划分是他将原初的“BHJ 表述”改动得面目全非的结果。最后,他不得不面对难以将克罗地亚案例融入其所谓的更加灵活分类中的窘境。罗只能通过不理睬那些与自己的阐释相矛盾的证据和解释来挽救自己的框架。因此,尽管引用了罗伯特·黑登和哈肯·威伯格的论述,罗仍然拒绝了他们将弗拉尼奥·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裔定义为挑衅方(相对于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裔而

① 其实,罗在此之前就考虑过这三种类型的“安全困境”,只是他用了不同的术语:不需战争即可解决(resolvable short of war)、不需战争难以解决(difficult to resolve short of war)和不需战争不能解决(irresolvable short of war)。罗甚至声称他的三种“安全困境”能够联系到华尔兹的三层次分析上,幸好在随后的文章中,他放弃了这种令人迷惑的观点。参见 Paul Roe, “Former Yugoslavia: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t Never Was”, pp. 388-389, p. 391, fn. 18。

② Jack Snyder,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p. 155.

③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 287; See Also Paul Roe,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p. 109.

④ Paul Roe,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p. 109; See Also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 288.

⑤ Ibid., p. 110.

言)的判断,并且没有提供任何理由。^①

如罗所注意到的那样,克罗地亚新宪法草案的第一部分将克罗地亚共和国定位为克罗地亚族的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民族和少数民族(other nations and minorities)成员的国家。宪法的第十二款同时规定:克罗地亚语和克罗地亚字母是克罗地亚的官方语言和字母。此外,图季曼还拒绝谴责曾经发生在雅瑟诺瓦集中营的暴行,而该集中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克罗地亚人伙同纳粹德国屠杀数以万计塞尔维亚人的场所。更糟糕的是,克罗地亚人并非只打嘴仗,“即使在塞尔维亚人居多的地区,双语的路牌仍然被人撕掉”。最终,“大批的塞尔维亚人被清除出官僚机构和警局,并随即由克罗地亚人取代。”^②无论如何衡量,都是克罗地亚人在威胁塞尔维亚人,这不仅反映在象征意义上,而且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中。

在上述压倒性的体现克罗地亚人挑衅性的证据面前,罗写道:“在它对南斯拉夫联邦存废问题上的总体立场来看,萨格勒布的政权(即图季曼领导下的克罗地亚政权)可以说是属于修正主义者(权力追求者)[即恶意行为体]。即便如此,在它与本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的关系这一点上来说,将图季曼视为在追求安全仍然是有一些依据的;他仅仅是误判了克拉伊娜地区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化的反应,而非故意试图压制塞族。”^③罗甚至将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挑衅称为“务实的”。^④

可是,如果连那种试图将塞尔维亚人降为二等公民的“克罗地亚化”都能被认为在追求安全,那么追求安全这个概念就不再保有任何有用的价值。罗虽然承认难以证明图季曼是在追求安全,但是罗拒绝接受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实际上是挑衅方这一事实。进而,罗不得不为图季曼进行辩护:“虽然可能在追求安全,图季曼政府经常反复不定,并不时向克拉伊娜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传递相互矛盾的信号。”^⑤

(4) 总结:一系列的错误

根据上文的分析,波森、考夫曼和罗运用“安全困境”来理解族群冲突的尝试受困于其扩张主义者的思维,并犯下了若干共同的错误(见表1的总结)。其中根本性的

① Robert Haden, “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m in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s”, *Slavic Review*, Vol. 51, No. 4, 1992, pp. 654-73; Haakan Wiberg, “Divided Nations and Divided States as a Security Problem; The Case of Yugoslavia”, 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COPRI), Working Paper, No. 14;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p. 297-301. 将图季曼视为挑衅者并不意味着米洛舍维奇就不是挑衅者。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即面对米洛舍维奇的宣传攻势和行为,图季曼被逼采取了挑衅性的政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图季曼是挑衅者这一事实。

② Paul Roe, “Which Security Dilemma?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The Case of Croatia”, pp. 297-298.

③ Ibid., p. 305.

④ Ibid., p. 297.

⑤ Ibid., p. 302.

问题是,这些作者相信(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安全困境”引发的,因为“安全困境”会导致螺旋式的冲突,而战争往往是行为-反应螺旋的产物。可事实却是,“安全困境”只适用于部分战争和螺旋状态。

表 1 关于“安全困境”的常见错误

作者 错误	波森 (1993)	考夫曼 (1996A;1996B)	罗 (1999;2000)	罗 (2001;2004)
1. 遗漏(恶意的缺乏)	+	+		+
2. 替换		+	+	+
3. 颠倒因果链条	+	+		+
4. 混淆调节因素与必要因素			+	+
5. 混淆可能的后果与必要因素		+		+

注:图由作者自制。

三 理性选择的“瘦身”运动

虽然族群冲突文献中的主流趋势是将“安全困境”概念扩展到面目全非的程度,但仍然存在一种“瘦身”(stripping-down)的明显趋势。后者集中体现在“理性选择”或“理性主义者”方法对族群战争和内战的分析中,它们去除了“安全困境”的大部分物质和心理调节因素。^①本质上,这种方法将“安全困境”降格为对能力和决心的不确定性的极度简化的评估(容纳在博弈模型的“讨价还价范围”)以及承诺问题(即谈判完成后国家不能保证将来不会违背)。^②

瘦身“安全困境”理论的尝试发轫于詹姆斯·费伦。在正确指出仅仅存在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并不能导致战争后,^③费伦将“安全困境”和战争的问题简化为“为

① 费伦将他的博弈理论化方法称之为“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但是,笔者反对这种将博弈方法称之为“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或“理性主义者”的标签方式;这样做导致我们失去了道德高地,因为该标签暗示它的批评者都是非理性的;而且,“理性主义者”和“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含有其他的意思。方便起见,本文保留了“理性选择”这个相对温和的标签。对使用理性选择方法研究战争的早期批评,参见 Stephen Walt,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5-48。

② 考夫曼误导性地将“安全困境”置于“硬核理性主义者方法”(hard rationalist approach)的标签之下,其目的在于降低“安全困境”在其分析框架中的分量。See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③ 笔者曾详细讨论了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安全困境”基本上不会导致国家间战争,参见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ter 3。

什么无法给出承诺必然引发两个理性国家间的战争的问题。”^①至此,费伦犯了三个错误。

首先,费伦(以及在他之后的那些“理性选择”方法的支持者)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承诺问题,仅仅就是一个将对他人意图不确定性的问题和对他人动机不确定性的问题混为一谈的新标签而已,^②而且该标签涵盖的实质内容更少。在费伦看来,承诺问题源于在合作协议已经达成的情况下行为体固有的欺骗倾向。然而,对于“BHJ 表述”来说,除了存在行为体会在合作中实施欺骗的可能性之外,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也受到那种国家可能怀有恶意和意图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的驱动。那么,仍然存在行为体相互间完全不能达成合作的可能性。最后且可能是最核心的一点批评是,虽然对于他人不会一直遵守协议的恐惧是承诺问题的一个核心论点,但是理性选择方法却因其无法模型化情感而对恐惧无能为力。

其次,为了确保战争现在变成了一个承诺问题以及在解释战争时可以完全撇开意图,费伦简单地主观假定这种问题并不存在:“国家不存在私有信息,动机(即意图)从不改变;因此,国家能够完美地理解相互间的动机。”^③当动机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而意图又被完全忽视(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被“承诺问题”所取代),“安全困境”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安全困境”非常依赖于国家的意图可以转变为恶性这种可能性。

再次,当费伦讨论客观的进攻优势对“安全困境”和战争的影响时(也就是一种物质因素),他忽视了潜在地驱动“安全困境”和战争的所有(社会)心理调节因素(比如恐惧、民族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认同)。

总体来看,理性选择方法无外乎仅仅将“安全困境”当做一个可信承诺的问题。^④可是,“安全困境”理论除了能够容纳理性选择方法所提出的承诺问题(即在合作中进行欺骗的动机)和私有信息之外,还包含远多于此的理论见解。首先,“安全困境”理论所理解的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包含了比理性选择方法所提出的承诺问题更多的

①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379-414, at p. 385.

②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 “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3, 2012, pp. 299-338。当然,费伦也想尽办法强调承诺问题与对意图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差别,参见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p. 401, 406。

③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p. 401。费伦错将动机等同于意图,参见第 21 页第 2 个脚注。

④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Containing Fear: The Origins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pp. 41-75, esp. pp. 52-53; Monica Duffy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Identity, Interests, and Terri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Barbara Walter, *Committing to Peace: The Success Settlement of Civil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维度。此外,“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同时取决于有形的/物质的和心理的调节因素。“安全困境”既能容纳那些为理性选择方法所容纳的物质因素(比如混居、地理),还能涵盖那些不能为理性选择方法所模型化(并因此拒绝承认)的心理因素(比如恐惧、对冲突历史的记忆和群体动员的话语)。实际上,忽视那些构成“安全困境”理论的重要成分的心理调节因素必然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安全困境”是如何驱动国家和群体走向战争。

这里的根本性问题在于,理性选择方法的支持者对于该理论自身的定位比较困惑:他们的模型到底是“有用的虚构”——即用来发掘并证明一些关于战争的重要动力,还是“奇迹制造者”——即充分地捕捉那些将“安全困境”和战争联系到一起的动力?^①

如果目标是前者,那么瘦身“安全困境”理论就是正当的,因为这样做使得(博弈)模型变得易处理并且能够发掘一些现象背后的重要机制。实际上,这样一种对“安全困境”的瘦身是必要的:(博弈)模型必然无法处理“安全困境”的心理调节因素(例如,恐惧和仇恨),甚至不能一次性处理“安全困境”的全部物质调节因素。但是,如果目标是后者,那么瘦身“安全困境”的正当性就存在问题了,因为这样做会丢弃很多独立地或交互式驱动国家走向战争的重要因素。这种将虚假的现实强加于现实之上的尝试只会带来误导性的结论。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理性选择方法的拥护者的目标都是后者,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模型来充分捕捉族群冲突(或战争)的普遍(甚至所有)动力。这样一来,虽然他们对“安全困境”的瘦身符合他们试图把理性选择方法的“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隐含)意图,但是其研究方案造成了诸多对“安全困境”在族群战争和广义战争中的角色的误解。最终,理性选择方法声称,族群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意识形态或阶级的)内战之间并不存在真实和根本性的差别。^②如此一来,族群冲突就被剥夺了其作为一种特殊冲突类型的地位。

① 关于“有用的虚构”和“奇迹制造者”的区别,参见 Paul K. MacDonald, “Useful Fiction or Miracle Maker: The Competing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4, 2003, pp. 551-565。

②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1996, pp. 715-35; Barbara Walter, *Committing to Peace: The Success Settlement of Civil Wars*.相反的观点参见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pp. 188-194。

四 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

上文的讨论并未否认运用“安全困境”来理解族群冲突的可行性。实际上恰恰相反,运用“安全困境”来理解族群冲突将会是卓有成效的,但这必须建立在恰当运用的基础上,即我们必须严格遵守此概念原初的“BHJ表述”。接下来,笔者将表明“BHJ表述”有助于我们更为缜密地理解族群冲突的动态,进而可以为创立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铺平道路。下文首先说明,一些从“安全困境”/螺旋模型中推导出的可能情形能够涵盖很多真实世界中的案例;随后展示了一个广义族群冲突理论的基本架构。

(一)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四类结果

对于两个过去一直和平共处,只是偶尔存在不愉快互动经历的族群来说,“安全困境”会在中央政权逐渐或突然崩溃时产生。或者,当中央政权被某个族群独占或支配,并转变为一个实际上的群体内部精英集团,而其他族群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助来维护自身安全时,“安全困境”也会产生(例如,处于胡图族控制下的卢旺达和被北方穆斯林控制的苏丹)。当上述任意一种情形出现时,对他者的恐惧开始在一方或双方群体内泛滥,因为一个能保护他们并大体中立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安全困境”由此诞生,并可能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①

首先,突现的“安全困境”可能被迅速控制住,因为中央政权被迅速恢复,或者双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安全困境”。乌克兰代表了前一种情况。乌克兰的中央政权被迅速恢复,而突现的“安全困境”相应地被迅速遏制。前捷克斯洛伐克则体现了后一种情况,当事方的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选择了和平分手。^②在这两个案例中,冲突得以避免,虽然两个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无法完全消除。与其他结果相比,这种结果仍然可能是最好的一种。

其次,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行为体(特别是精英)可能不愿意或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缓解“安全困境”,但是由于双方相互间并不存在恶意,所以没有一方试图故意恶化“安全困境”。这种情况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处于放任的恶化状态。此时,由于双方都无恶意,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依然存在。1990年春季之前的

^① 方便起见,笔者将集中关注精英领导的冲突动态。当然,“安全困境”也能够涵盖大众领导的冲突动态(比如,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案例)。

^② 两个群体间的和平分离同样需要采取措施来控制“安全困境”。

摩尔多瓦德涅斯特地区的族群关系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①

再次,“安全困境”可能被恶化,因为一方或双方的一些精英尽管并未对另一族群抱有恶意,但是却通过煽动族群紧张关系和仇恨来争权或避免被边缘化。换句话说,两个族群内的精英会为了工具性目的而参与族群性争相竞价(ethnic outbidding)。“领导人设定挑衅性的目标(常常是支配其他群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选民要求这样,而是因为领导人相信一旦他们成功挑起了暴力冲突,那么他们就能够利用这种‘团结在国旗周围’(rally around the flag)的效应来扩大自身的权力并削弱政治对手的合法性。”^②

即使某族群内的一方精英并未对另一个群体怀有恶意,但是,这种情况还是会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最终演变为实际的冲突:其一,工具性的族群性争相竞价会恶化“安全困境”动态,进而导致该动态逐渐超出那些仅仅出于自利目的而煽动紧张和仇恨的精英的控制。部分人群(比如一些恶棍)可以劫持族群间的互动,并强迫那些并未怀有真正仇恨的精英走上一条不归路。因为,这部分精英时刻面临被那些真正怀有仇恨或自称怀有更多仇恨的精英取代的危险;其二,面对其他精英(无论是否心存真正的仇恨)的竞争或潜在的争相竞价,那些最初并不怀有真正仇恨的精英可能会变得更加极端化或者装作更加极端。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精英们最终将自食其果,即便他们一开始并未怀有对其他族群的仇恨。1989年秋季到1990年5月间,摩尔多瓦的情况可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在摩尔多瓦领导层内,摩尔多瓦人民阵线领导的大规模动员和随后针对亲俄者的暴力导致温和立场越发难以获得支持,结果就是反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被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所取代,而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又最终被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所边缘化。^③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认为,族群政治动态最终将原初的“安全困境”转化为真实的安全威胁。

最后,族群互动中的一方或双方可能确实怀有真正的恶意。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困境”仅仅在互动的最初阶段才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当中央政权崩溃时)。一旦一方或双方(尤其是精英)对另一方产生恶意,“安全困境”就停止了运作并转变为真实的安全威胁。除非国际社会能及时干预,否则这种情况几乎必然导致大规模暴力或战争。胡图族控制的卢旺达和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正是这种动态的真实写照。

①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24.

②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p. 155. 如果领导层的精英怀有真正的仇恨,那么就不存在“安全困境”。当然,了解领导人(或某个精英)的真实想法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③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p. 123-125.

(二) 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

“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本质上是一个有助于理解两个群体间的互动是如何驱动他们走向冲突的动态模型。此外,“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还具有极度的包容性以及相应的整合性:该模型不仅能捕捉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基本要素,而且能够将很多的物质和心理因素以及国内政治(通过行为-反应循环)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内。^①因此,“安全困境”/螺旋模型能够为建构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部分基础。下文的讨论意在证明这种理论的潜力,而非谋求立即发展出该理论。

例如,“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能够整合被不同族群冲突研究方法所识别出的全部心理和物质因素:它们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的心理和物质调节因素。罗杰·彼得森强调的四个心理因素(恐惧、仇恨、不满和暴怒)可以被视为螺旋动态的心理调节因素,从而轻松地整合进“安全困境”/螺旋模型中。^②首先,恐惧(对生存而言)一直是“安全困境”模型和更庞大的现实主义文献的核心组成单位,而霍洛维茨和考夫曼所强调的对族群灭绝的恐惧(fear of group extinction)也体现了相似的观点。^③对于仇恨的研究同样存在相近的视角,如卡普兰所识别出的“古代”仇恨或者考夫曼所理解的“现代”仇恨(例如,关于昔日暴行的神话)。^④仇恨能够增加恐惧,因而可以恶化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或螺旋动态。或者,仇恨可能会带来恶性意图,进而导致所有的“安全困境”停止运作并被转变为安全威胁的螺旋。

同样,既有文献中识别出的很多物质因素可被视为螺旋动态的物质调节因素,进而被轻松地整合进“安全困境”/螺旋模型中。例如,由托夫特所集中关注的地理因素一直都是“安全困境”文献所讨论的一部分。^⑤再如,经济利益或其他物质利益(如领土)冲突的存在也可以被引入“安全困境”模型,因为利益冲突一直都是(现实主义的)冲突理论的核心讨论对象。^⑥最后,盟友(外国对族群冲突的干预)恶化“安全困境”的

^①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② Roger Petersen,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e also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p. 111, pp.115-116;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pp. 25-27, 31-32.

^④ Robert D. Kaplan,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94;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p. 25, pp.30-32; Stuart J. Kaufman, “Symbolic Politics or Rational Choice?”, pp. 45-86.

^⑤ Monica Duffy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Identity, Interests, and Territory*;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⑥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关于经济利益对族群冲突的驱动作用,参见 Susan Woodward, *Balkan Trage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可能性早已受到了承认。^①

但是,上文提到的任一因素都不能独立地提供关于族群冲突的充分解释。理论上的挑战之处在于将上述所有因素容纳进一个整合的框架内。“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即提供了这样一个整合的路径,因为该理论/模型本身就是动态、互动和整合性的。

例如,以“安全困境”/螺旋模型为基础的互动方法不仅与社会建构主义者对安全和“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研究可以并存,^②而且可以容纳后者。精英对族群认同、仇恨和恐惧的操纵可以被理解为建构固化的族群认同和制造“本体性不安全”意识的过程。这种互动方法与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的讨论也是相容的,因为后者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安全”(societal security)——同样集中关注(集体)认同。^③很可能,“本体性安全”和“社会性安全”基本上就是霍洛维茨和考夫曼所强调的“对族群灭绝的恐惧”。此外,由于安全和认同是可以被建构和重构的,通过重构族群认同来促进族群和平虽然困难重重,但也是可能的。^④

同样,由丹尼尔·拜曼提出的关于族群冲突的四个独立理论(或者说驱动力)——族群“安全困境”、身份忧虑(status concern)、霸权野心和精英抱负——能够而且应该被纳入一个整合的理论中。^⑤简而言之,当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群体试图维持其霸权,但另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多数群体希望获得平等权利甚至霸权时,这两个群体就陷于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或者说螺旋模型之中(取决于双方的意图)。在这一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来自两个群体的精英试图从中渔利,无论是为了个人利益(如领导地位、国家英雄、甚至是新民族国家的缔造者),还是群体的利益(如民族国家或“纯净的”民族国家)。这种动态极其不稳定,很容易导致战争。克罗地亚在图季曼上台之后的事态发展就悲剧性地体现了这种一般性动态。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运动同样是对此很好的印证。复兴党政权是一个泛阿拉伯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力求将国家阿拉伯化,包括对库尔德人。当库尔德人揭竿而起保护自己的集体身份和文化

①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② Badredine Arfi, “Ethnic Fea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1, 1998, pp. 151-203;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p. 341-370.

③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i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pp. 46-86.

④ Daniel Byman, *Keeping the Peace: Lasting Solutions to Ethnic Conflicts*, Chapter 5.

⑤ Ibid., Chapter 2. 拜曼对“安全困境”的讨论基本上追随了波森、考夫曼和费伦。拜曼还注意到很多应用“安全困境”分析族群冲突的尝试常常“与此概念的经典国际关系定义相距甚远”(Ibid., p. 229, fn. 1)。

时,那种典型的螺旋开始起作用,并再次证明了它的致命性。^①

为了理解国家间的冲突,一开始将国家假设为单一行为体往往行之有效。但是在理解族群间的冲突时,即使仅仅在初期分析中将族群假设为单一行为体都是错误的:精英和大众间动态的互动是理解族群冲突的关键。因此,另一个理解族群冲突动态的关键是弄清群体(精英和大众)内政治和群体间动态的相互关系。这样看来,将“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方法和“颠倒的第二意向”(second image reversed)方法结合起来是理解族群冲突动态的必备路径。^②我们可以简单地猜测:群体间政治对群体内政治中的温和派和民族主义精英的影响存在差别,而群体内政治可以限制妥协方案在群体间政治中的可行性。

在每个群体内部,至少存在两组行为体——精英(包括领导集团)和大众,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无论精英还是大众都是分裂的。因此,两个族群之间的互动将是非常复杂的。假设一个群体的精英会对另一个群体采取两种立场(温和或侵略性),而大众基本上都是温和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关于族群间政治的可能组合的简化图(见表2),^③该表包含至少六种情形。

在情形一中,每个群体内的精英都一致怀有侵略性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因此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想要阻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该情形下并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困境”。

在情形四中,每个群体内的精英都一致持有温和立场,因此和平结果(分离或共处)的可能性很大。此时的“安全困境”会基本保持在潜伏状态或者被遏制,而国际社会仅仅需要鼓励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案例都属于这种情形。^④

① 如果采用罗杰斯·布鲁贝克的定义,那么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和复兴党统治的伊拉克则都属于“民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s)。Rogers Brubaker,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Daedalus*, Vol. 124, No. 2, 1996, pp. 107-132.

②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27-460;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912.

③ 两个群体的大众都一致怀有恶意,而两个群体的精英都一致持有温和立场,这种情形极其罕见并难以持续,因为大众无疑会促成一个更加激进的领导层的出现。因此,这种情形会迅速转化为大众和精英都一致怀有恶意的形态。此时,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④ Paul Roe, *Ethnic Violence and the 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 London: Routledge, 2005.

表2 精英偏好与族群冲突结果

		B 族群的精英		
		一致 (侵略性)	一致 (温和)	分裂
A 族群的精英	一致 (侵略性)	战争几乎 不可避免(一)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二)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三)
	一致 (温和)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二)	和平解决的 可能性很大(四)	和平解决的 可能性较大(五)
	分裂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三)	和平解决的 可能性较大(五)	战争与和平的 可能性都存在(六)

注:表由作者自制。

在情形五中,一个群体内的精英一致持温和立场,而另一个群体内的精英则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它属于次优情形。在此,和平结果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仅低于情形四。如果精英一致持温和立场的族群能够与精英分裂的族群中的温和派保持密切合作来控制螺旋动态,并共同边缘化精英分裂族群中的民族主义派,那么该情形下的“安全困境”可以被遏制。同样,国际社会仅仅需要鼓励族群间和平协议的签订。但是,在应对民族主义者对同一族群内温和派的反攻时,国际社会必须要避免采用粗暴的战术。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唐纳德·霍洛维茨所提醒的“使温和行为受益”(make moderation pay)。^①

在情形二和三中,一个群体内的精英一致怀有侵略性意图,而另一个群体内的精英处于分裂或一致温和的状态,此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国际干预的目标却非常清晰。国际社会需要尽早承诺遏制怀有恶意的一方,以阻止冲突螺旋的上升,否则实际冲突爆发的概率将会显著增大。米洛舍维奇治下的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与其境内塞尔维亚族以及苏丹的北方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这三个案例都对应于这两种情形。

在情形六中,两个群体内的精英和大众都处于分裂状态,这种情形最为常见同时也最为复杂。该情形有时会转变为上述的某一种情形(即一种中间结果),进而可能会走向战争或者和平。任何完善的族群冲突理论都应该考虑、分析和解释这种情形。

^① Donald Horowitz, “Making Moderation Pay: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in Joseph V. Montville ed., *Conflict and Peacemak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exington, M. A.: Lexington Books, 1990, pp. 451-475.

最后,尽管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也许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冲突的大部分责任置于精英身上,但是将全部责任推给精英必然会误入歧途。为什么大众会跟随恶意的领导人或精英,特别是当大众面临极大的冲突风险和非常不确定的潜在收益时?因此,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必须回答这个难题。一种可能性是一方或双方的恶意精英可以轻易地动员一部分人群(比如暴徒)来伤害另一方,以至于另一方必然在仇恨和暴怒的驱使下进行反击。^①一旦上述互动出现,发起暴力一方的普通大众即便没有参与最初的暴力挑衅,也产生了害怕成为另一方复仇对象的恐惧。结果,每一方的大众都“理性地”感觉必须支持目前的大规模暴力和族群战争。^②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必须能够涵盖上述所有的事实和情形。

结 论

本文批判性地检视了运用“安全困境”这种分析工具来理解族群冲突的诸多尝试。本文的研究表明,目前的很多概念运用因受困于对“安全困境”不完整和不准确的理解而误入歧途,并且为我们处理族群冲突提出了一些不可靠甚至适得其反的对策。

若要通过“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来理解族群冲突,应忠于此概念的最初的“BHJ表述”。因为“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具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它们能够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基础。与整合群体内政治和群体间政治的“双层博弈”方法结合后,这样一个能够为管理和遏制族群冲突提供重要见解的理论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它将是我们的未来的研究课题。

毫无疑问,在拥有一个完善的族群冲突理论之前,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的知识仍然有限,并在给出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时保持谨慎。实际上,即便已经拥有这样的族群冲突理论,我们仍需谨慎,因为每个族群冲突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忽视这些特性,给出包治百病的药方,则很可能会受到历史的谴责。

(作者简介: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John Mueller, “The Banality of ‘Ethnic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42-70.

^② Rui J. P. De Figueiredo Jr. and Barry R. Weingast, “Rationality of Fear: Political Opportunism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arbara F. Walter and Jack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1-302.